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

金忠严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013045748

D61
303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

金忠严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53948

D61
303

0130427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 / 金忠严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202-06755-0

I. ①马… II. ①金…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
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2315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
著 者 金忠严

责任编辑 王 岚 李 耘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家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11 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755-0 / D·67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综述	(6)
三、本书的可能创新之处	(11)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	(14)
第一章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传统文化观	(17)
一、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18)
二、树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	(44)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含义和依据	(81)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含义	(81)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要性	(90)
三、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史启示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 相融合	(107)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13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矛盾和规律	(160)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基本矛盾	(160)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主要矛盾	(168)
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非主要矛盾	(176)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规律	(18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思路	(210)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实践层面的融合	(211)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学术层面的融合	(246)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融合	(281)

四、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292)
五、警惕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	(299)
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12)

导 言

一、研究缘起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百年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①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93年5月创办了《国学研究》期刊。《人民日报》在1993年8月16日以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整版篇幅给予报道。以此为标志，“国学热”开始兴起，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的继续和深化，当前正在不断升温^②。这里的“国学”并不是指中国

^①为避免重复，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以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简称传统文化。

^②中央党校王杰认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共出现了四次“国学热”现象。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国学热潮。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国内创办了许多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北京大学有《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清华大学有《国学论丛》、《国学杂志》、《国学辑林》，大东书局有《国学月刊》。在此期间，产生了“东方文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代表人物主要有辜鸿铭、梁漱溟、张君勱等。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国学热，突出表现是对孔子的重新评价，1984年在孔子诞辰2535周年之际，成立了由匡亚明任会长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标志着全国性有组织地研究孔子和推行儒学的中心已经形成；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曲阜联合举办了首次国际性儒学会议，标志着儒学研究已经是一项国际性的合作和互动。在这次国学热中，除了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外，还成立了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研究联合会以及中国实学研究会等组织机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国学热，主要特点是在高校兴起，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创刊，1995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告成立了孔子研究院，等等。目前正处于第四次国学热阶段，2004年被称为“国学年”，自此以后，国学热表现在多方面、多领域。在民间，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有700万个家庭、7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了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重修家谱、重建私塾等行为。在出版方面，1995年启动了《大中华文库》工程，1996年启动了《东方文化集成》工程，2003年启动了《儒藏》工程，等等。在学术界，一是2004年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羨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并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二是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三是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等联合举办了“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在政府方面，一是各种祭祀仪式由民间转向官方；二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三是“汉语桥”工程的推广；四是“孔子教育奖”的设立；五是重视传统节日并将清明节等定为法定节日；六是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以及“文化遗产日”的设立，等等。（参见王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现象——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载理论网。

的学术总体，而是特指传统文化^①。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以及文化界探讨争论的热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地兴起了一股新启蒙运动思潮，主张“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核心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思潮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引起党的领导人以及党内思想家、理论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诸多著作中以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这一事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时隔50多年后再次兴起的“文化热”和“国学热”，虽然与新启蒙运动表现形式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但根本问题仍然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当然这里也包含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如何可以归结为一个如何，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今天，面对“国学热”的愈演愈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能无语，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创造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何文字的东西都是对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社会现实是社会理论研究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用

^①“国学”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争议的概念和名称。“国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指学校。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国学”指的是区别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这个意义上的“国学”的内涵在不同人眼里并不相同，可以区分为“作为材料的国学”、“作为主义的国学”和“作为文化的国学”。所谓“作为材料的国学”，就是把国学看作是中华民族过去历史、学术等方面材料的集合，因此研究国学的要务在于辨明其中之真伪、厘清其中之体系、解析其中之因果关系，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语），这主要是学术界的事情。所谓“作为主义的国学”，就是站在通经致用的角度看待国学，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以为今用，二是复兴中国传统思想，以改变当下西方学术文化盛行的现状。所谓“作为文化的国学”，就是把国学等同于广义上的中国文化，但凡中国的哲学、历史、美术、文学、医学、地理乃至民间习俗等等皆可归入其中。此种国学的外延最为广泛。对于“作为文化的国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主要针对普通民众，首要问题在于普及国学基本知识。（参见范美霞、何志均：《国学的不同内涵及其继承发展》，见《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张岱年认为国学就是一国系统而专门的学问，方立天认为国学的概念是开放的，国学是指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包括近现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参见方立天：《仰望崇高——方立天自选集》，第436-43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人间奇迹”、“东方神话”，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为温饱发愁，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事物是辩证发展的，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出现了许多“成长中的烦恼”。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面对这些前进发展中的问题，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加速推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文化对于加强以上四个文明的建设，蕴含着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生活总体上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活不断得到相对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现实紧迫性。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主要内容是传统哲学，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生哲学。从这一高度看，传统文化就是一部关于如何做人的文化，对于实现中国人的健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整理挖掘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构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促进中国人的健全发展。

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文化来到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要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普遍接受，就必须善于处理好与这个国家原有文化的关系，在两者的融合中实现本土化、大众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总体上看，仍然没有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和学理层面，没有完全走向民间，走入寻常百姓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还没有被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普遍接受。相反，今天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和危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是一码事，马克思主义被普遍接受却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大众化。要实现本土化、大众化，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正确考虑和积极面对中国人几千年里形成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等。因为，谁也不敢说只要是好主义，如果不经民族化、本土化，就一定能被一个民族从根本上、整体上接

受。中华民族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这是奇迹。奇迹的答案隐藏在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中，特别是隐藏在反映这个民族优秀气质性格的民族精神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任何时候、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丢弃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几次外族入侵并执掌政权，但无论是胡人所创立的元朝还是满人所创立的清朝，谁也没有废弃汉人所创造的思想文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多次强调要弘扬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这一愿望，需要我们做出艰辛的探索。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尊孔读经”肯定不行，因为近百年里中华民族所取得的成就根本上靠的不是孔夫子，而是马克思。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要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根本上必须靠马克思，但也不能丢孔夫子。最可靠的方法恐怕是要借助马克思去拯救孔夫子。所以，无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还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转换，都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否则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我1995年大学毕业后入伍，十几年来，大多数时间在深山老林里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常年居深山，日夜护神剑。在工作实践中，我培养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浓厚兴趣。愈学愈信，愈信愈学。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所修得的“正果”，与其说是一纸文凭，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初步理解与运用。我所工作的地方，如果对于一个宗教信仰徒来说，绝对是修行的好去处。无奈我是俗人，白天在训练场上忙活一天还好，到了晚上孤独寂寞骤然侵上心头。于是我就经常在夜下孤灯品味中国古人的诗词歌赋、美文，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沟通心灵。白天，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磨练着我的心志；夜里，传统文化的经典慰藉着我的心灵。渐渐地，我对中国的古圣先贤产生了感情和敬意。于是，我开始思考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起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中、西、马三大哲学流分了家，自立门户，很少对话，隔行如隔山，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几乎患上了学术上的‘分工痴呆症’^①”。中央党校许全兴认为，

^①王东：《21世纪哲学创新论纲——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形态论》，见《中日学者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第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中国自己的“老祖宗”。中央党校董德刚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三个“老祖宗”^①。北京大学赵敦华提出，打破中、西、马界限，树立大哲学观念。北京大学王东指出：“21世纪中国哲学现代新形态，不是中、西、马三大哲学源的单线发展，而是有如上述三大源头汇聚在一起而构成的浩荡长江大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东西——中国哲学中的活东西，三者熔为一炉。”^②专家学者们的思想点燃了我的欲望，年少狂狷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半斤八两，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这一研究题目。

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一般的看法是说两者的“结合”。经过和导师商量，我们认为叫“融合”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鉴别，进行改造和拯救，然后将经过鉴别、改造和拯救后的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经历这样改造后的“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好主义”。这个“好主义”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如果用“结合”，总给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硬“拼凑”在一起的感觉，有“缝隙”的嫌疑。第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从狭义上说，“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③本书中所指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本书所指的传统文 化，主要是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其中的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同时也兼顾其他流派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新儒家。

^①三个“老祖宗”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中国人自己的“老祖宗”，以及西方国家的圣哲先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②王东：《21世纪哲学创新论纲——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形态论》，见《中日学者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第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③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685-6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二、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综述

在理论界，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当前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能融合；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可以融合，但所处的立场不同，有的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有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一种观点：总体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两个对立的体系，两者不可调和。

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和人士，“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单纯的外来文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不到结合点，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比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与中国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际和谐、主张‘和为贵’的思想不相容；又如，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而忽视人和人类精神的作用，与中国的‘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①台湾学者吴安家认为：“自从1949年以来，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甚为敌视。因为中共所信奉的马列主义，系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若欲‘立’马列主义于中国，必先‘破’中国传统文化。”^②1994年陈立夫在台湾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中国，不适宜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孔子讲的是彻底的唯心论，马克思讲的是彻底的唯物论，所以，大陆上讲“社会主义”一定要照《礼运篇》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讲。照《礼运篇》讲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放弃马列主义。^③

大陆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持否定论的普遍看法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由于时代的差异、历史背景的差异、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二者难以结合。^④有的学者认为，结合论的主张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古人现代化，任意比附，将孔子打扮成古代的马克思。“某些学者完全不顾历史条

① 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② 自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第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③ 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④ 同上书，第383页。

件和理论背景的比较，而是任意地把儒家经典中的某些道德箴言抽取出来，再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作静态的比附，进而认定‘这是唯物的’，‘那是辩证的’，‘这种观点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那种看法是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在这类戏论儒学的现代点金术中，历史的、科学的、严肃的研究往往被哗众取宠的喧嚣淹没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变成一种庸俗的相对主义原则，即任何特定的历史内容都可以被诠释者轻率地掏空，并赋予与其原旨风马牛不相及的现代思想，然后断然宣布某一命题或某一体系的复兴。”二是犯了观念决定论的错误。“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来理解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本质上是以‘观念论的历史叙述’为基础的。在这种观念论的历史叙述中，历史成了典籍文化的载体，典籍是操纵历史的灵魂。……历史不能仅仅以典籍文化传统来说明，未来也不能仅仅以典籍文化传统来许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要的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典文本相结合，而在于与变革现实的实践相结合。”^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季羨林在他的《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中论及东西方文化时这样讲到：“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②这一主张，季羨林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其中暗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立。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中，针对季羨林的观点指出：“季氏晚年地位尊隆，发言作文太易，而不知藏拙，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虚骄肤浅，较之梁漱溟式的文化观犹等而下之。论其言，即鲁迅所谓‘专门家的话多悖’；论其行，则近乎周作人所谓

^①吴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思考》，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第178-1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②季羨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老人的胡闹’矣。”^①

第二种观点：总体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冲突，可以融合起来。这一类观点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从而使儒学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北京大学杜维明认为，儒学要得到大发展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主义对话^②。北京大学汤一介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本开新”，所谓的“本”，是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新”，是指融合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激进主义（汤一介用激进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文化正处在“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开始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第三阶段。在这第三阶段中，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③清华大学钱逊认为：“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④另外，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提出的“转化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提出的“创造转化”，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提出的“和合转生”等等，也都包含着传统文化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含义。

第二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发展，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⑤“以往人们常常片面地将这里提到的‘统一’、‘结合’仅仅理解为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的统一或结合，而无意识

^①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262-2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②钱发平：《儒家简史》（序言），华龄出版社，2005。

^③汤一介：《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第277-278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④钱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刍议》，载《炎黄文化研究》，2004年第1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人民出版社，1991。

地排除其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或结合，这显然是偏颇的不正确的。”^①邵汉明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有两层含义，一是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和制定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二是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发掘并弘扬民族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另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述和理论构建上，也要努力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化形式^②。胡乔木认为，“中国是东方大国，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文化。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作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这就涉及对中国文化怎样分析。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说成封建主义的。有些文化是有阶级背景，有些则不受或不直接受阶级利益支配。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需要认真研究，答复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料太丰富了，要充分研究它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党一成立，就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对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没有完成。我们不能责备前人，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全国解放后，虽然有了条件，但很可惜，应该做的努力做得很差。没有集中很大的力量来做深入的探讨工作……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③冯友兰、张岱年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冯友兰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张岱年指出：“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④冯契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

①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②同上。

③《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35~236页，人民出版社，1999。

④张岱年：《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见《张岱年自选集》，第59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主张。中央党校许全兴、侯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等等，都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当前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对两者关系的态度并不十分鲜明，有的甚至排斥传统文化。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可以融合，但是对两者的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地位的认识缺乏应有的高度。本来，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解决，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诸多原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重视都落后于毛泽东时代，这就导致今天的理论界对两者的融合整体上仍然处于论证阶段。2008年10月，中央党校哲学部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无论是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还是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大多数发言和论文仍然是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可以融合。对于如何融合，很多文章还是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还是举例说明两者可以融合。对于两者的深度融合，即运用传统文化特有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的文章和专著并不多。

二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研究，个案分析比较多，缺乏在专题个案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综合性的研究。目前，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分析研究上。从国外研究来看，国外汉学界“十分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因素对领袖人物思想的影响，注意到政治领袖人物行为中的传统因素。这种学术研究使他们较早地就开展了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外自由派学者把‘毛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列宁，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①从国内研究来看，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著作更多，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汪澍

^①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第18、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传统下的毛泽东》，李锐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先进文化》，陈卫平的《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通过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邓小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裴传永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从邓小平理论的思维方式、学术风格、语言风格以及邓小平民本理论、富民理论、小康理论、用人理论、法治理论、德治理论、教育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和平共处理论共计十二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说，超越个案分析，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前以及今后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难题。

三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和论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仍然是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两者的融合中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当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实质是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如何评价看待其他思想文化、其他主义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观不正确就不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就不能树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就会在根本上制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进一步讲，当前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平心静气地看待传统文化，很可能与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

三、本书的可能创新之处

本书是笔者站在前人肩膀上殚精竭虑思考的结果，或多或少谈出一点自己的想法，具体如下：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置于马克思主义观的视域下。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所回答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求回答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中拿来什么，笔者认为要重点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中拿来集中体现其科学思维方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即是说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提供给我们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求回答应当对未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笔者认为要以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未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好主义”的代名词。这就必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拿来传统文化中科学的、合理的、有价值的“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殊命题所包含的一般命题是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要求传统文化的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①。在此基础上，笔者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实践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

^①是否存在普适价值的问题，是2008年底以来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当前争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人认为存在普适价值。侯惠勤在2008年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的文章《“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一文中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尽管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论证‘普世价值’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及这一讨论如何适应了当代人类发展的愿景，但事情并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重性，但决定其性质的是其主导方面，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这一讨论的核心，因而其在本质上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当今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这是客观现实，但是价值多元化实质上是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多元化，价值多元化所带来的冲突实质是价值具体实现形式的冲突，并不能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如果承认人类社会具有一般规律，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就理应承认普适价值。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孤立存在的普适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适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实际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就存在普适价值多次做过明确的表态：胡锦涛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在2008年新年寄语中，他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温家宝在2006年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在2007年“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峰2011年4月16—17日在洛阳召开的“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能上当。”中央党校董德刚认为，从表述上看，用“普适价值”比用“普世价值”更好一些，普适价值体现和反映着真理，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用“普世价值”表述，容易产生把普适价值绝对化的负面影响。